

正面战场作战研究的新成果

——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罗焕章

新年伊始,由郭汝瑰、黄玉章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问世了。这是有 120 余万字。附作战要图 100 幅颇具分量的上下两册专著。全书总共分为 9 章,第一章叙述中日战争的历史背景,第二章记述中国的局部抗战,第三至九章记述全国抗战开始至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各次作战,并且以书首尾的绪论和后论,前后呼应,贯通一气。该书执笔者和编审者是包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国共两党的将领、研究中国现代史和军事史的学者在内的 30 余人的群体。作者站在中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深入研究中外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历经 6 年时间,4 次修改,终于在七七事变 65 周年之前完成。该书无论就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方面,还是使用资料的权威性、广泛性方面,以及思想性、学术性方面,都可称目前抗日战争正面战争作战研究的高水平成果和最新成就。它的显著特色有以下几点:

一 对每战役的叙述详尽,资料丰富

要透彻地研究一次作战,必须了解双方的作战企图、方针、计划、部署及作战的具体经过。往往因为某方面的资料不全,作战过程不具体,使研究难以深入。本书作为正面战场作战研究的专著,

最突出优点即是对每一大的作战,均尽量详细交代双方战略或战役意图,作战指导方针、作战计划以及兵力的组织和部署。为保持其客观原貌,不惜篇幅地全部或大段引用了原文。对作战经过的叙述,力求详尽、具体,即侧重主要作战方面,又不忽视次要作战方面。双方参战部队序列和作战要图是研究作战的重要资料,它具体反映部队建制、番号和作战空间、方位。本书对每一大的作战,均详列出双方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和战斗经过要图,以武汉会战为例,要图有6幅,指挥系统表有8份,可谓详细。本书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和馆藏大批有关档案,以及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等为基础,广泛使用大陆、台湾的文献资料和美、英、德等国的资料。参考的中外图书达300余种,仅引文就引用了290多部。还特别侧重运用战斗详报、作战总结、作战日记,注重使用当时报刊资料。从选用和取舍资料中,还可以看出作者用相当的精力研究分析资料,对资料进行考证,注意辨析国民政府时期军事档案和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中存在的一些夸张和不实之处。

二 对军事战略、战役等全局性问题多有较深入的论述

关于持久消耗总战略,书中说如果不论其他方面,仅从总体上就战略总方针的本身而言,国民党采取持久消耗总方针符合中日力量对比的客观实际;其一面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一面培养自己的力量以及在战争初期实施以空间换时间等的原则,就战争全局而言,也是符合中国的特点的。但是我们从实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和实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坚持持久抗战来分析,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方针主要存在着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将持久抗战规定为两个阶段,实质上“持久”中仍含有“速胜论”的思想。

蒋介石规定抗战第一期实施“防御的战略”,第二期实施“转守为攻的战略”。认为由战略防御直接转变为战略反攻,其间不存在一个战略相持阶段,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证明它不符合中国持久抗战的实际情况。第二,以战役上阵地防御的持久消耗战作为达到战略上持久消耗战的主要手段。战争初期一定的坚守防御阵地战是应该而且必要的,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对某些战略要点的阵地防御战也是应该而且必要的。但从战争总体看,在技术装备、战斗素质等方面均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宜以持久的阵地战作为抗日作战的主要形式。而正面战场绝大多数战役的作战形式是以持久的阵地防御战为主,与日军对拼消耗,因而造成军队损耗过大,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第三,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基本上执行的是消极防御的路线。从战略防御阶段直到 1945 年日军实施战略收缩为止,正面战场(不包括缅甸战场)除 1939 年冬季攻势等作战外,都是在日军发动攻势时,被动地应战、抗击。

关于正面战场的地位作用,书中指出国民党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 8 年的抗战,并在战争初期主动开辟淞沪战场,分散了日军的兵力,对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和对实行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是正面战场的主流,应当予以肯定。正面战场担负着较大规模的正规战任务,抗击敌人的较大规模进攻,在 8 年抗战中,正面战场共进行 22 次会战,一部分为反击战。正面作战线虽然后撤了几千公里,失地 100 多万平方公里,但这是制订“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略时所估计到了的,达到了分散敌人之兵力、消耗与迟滞敌人、掩护大后方等战略目的。在 8 年的浴血奋战中,正面战场部队伤亡 320 多万人。广大爱国官兵同仇敌忾,尽忠报国,他们的血洒在捍卫民族生存的神圣而崇高的正义之战中。他们的爱国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崇敬和怀念。

关于敌后游击战,书中指出全国抗战开始,国民党最高军事当

局并未认识到敌后游击战的重要性。华北敌后游击队的蓬勃发展,使他们开始认识到游击战对抗战的重要意义。1938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以我三分之一力量投入敌人后方”。随后设立冀察、鲁苏两个战区。鲁苏战区正规军约10万人,地方保安旅团及游击队约15万人,总数达25万人。冀察战区亦大致如此。如此众多的兵力进行游击作战,应该大有作为,但由于国民党的敌后部队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又采用不适合敌后游击战的呆板战术,而且与抗日的友军为敌,所以在日军“扫荡”、围攻下,大批将领率部投敌,后转而协同日军“围剿”残存的抗日据点,致使驻地日蹙、兵力日削,在不过三四年的时间里即彻底失败。真正贯彻总的战略方针、坚持敌后、完成了抗日游击战争伟大战略任务的,主要还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敌后抗日武装。

关于许多作战失败的问题,书中认为正面战场许多战役战斗,有的本不应失败的却失败了,有的本应获得更大胜利却未能获得,而且部队伤亡过大,以致消耗敌人远比自身的消耗为少。书中特别针对抗战中、后期一些严重失败的作战,指出除因其作战指导失误外,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军队的腐败。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抗战意志衰退,从军事委员会主要决策者到战区各高级将领,都是以保存实力、坐待胜利为指导思想,失去了抗战初期的积极性。如1941年10月,日军为策应第二次长沙会战,在强渡黄河进攻郑州时,于霸王城附近的邙山头留驻2个步兵大队,构筑了作为以后再次南侵时的桥头堡阵地。第一战区数十万之众,对此背水为阵、孤立突出并与其后方联络极为困难的少量日军,竟然坐视不问,任其长期存在,使日军随时可以由此南侵,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第二,军队贪污腐化,汤恩伯部每个单位均有空缺,汤本人及其军队将领都与日伪方面有密切的“贸易”关系,从中牟取暴利,大发国

难之财。这样的军队不可能全心致力于抗战,一战区在会战检讨中即说,该部“一经与敌接触,亦即南撤”。第三,军队的纪律败坏,当地人民恨之入骨。河南人民说:“河南灾荒除水灾、旱灾、蝗灾外,还有汤灾。”军队所到之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这样的军队得不到民众的支援。应该说,书中对根本原因的分析是客观的、深刻的。

三 对每次大的作战多有宽视野的深入评析

在掌握和吃透一个作战的全部情况后,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对它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评论。这是有相当难度的一件事。本书作者的评析具有新意。如在南京保卫战简析中指出,南京保卫战的失败,固然是由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如仅就战略角度而言,则最主要的是继续淞沪会战的失误:政府统帅部在理论上已经认识到,并且在口头上一再宣称打持久消耗战、打攻势防御战,但主要决策将领囿于已经形成的军事思想和惯用法战,实际上执行的是单纯防御方针。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南京时,第七战区在杭州方向的皖南地区有 4 个集团军,最高统帅部连续令其一退再退,并未采取任何策应南京作战的积极措施,而令南京卫戍军困守围城、孤军奋战。假如组织一部兵力向日军后方实施运动攻势作战,则南京的形势必有一定程度的缓和。当时日军的后方相当空虚,交通线留置兵力不少,如攻击其侧背,切断其联系,日军决不会置之不顾而仍以全力进攻南京。南京保卫战的失败,仅就其本身作战指导方面而言,指挥紊乱、计划不周和准备不足,是外围作战阶段未能有效地利用吴福线和锡澄线既设国防工事迟滞、消耗敌人,以争取时间完善南京防御组织的主要原因;在防御战斗组织指挥上,既未形成全纵深抗击的部署,又缺乏快速应变的准备和能

力,是南京过早失守的主要原因;战略与战役指导背离战略方针及战役实际,致使作战指挥在关节问题上犯了错误,这是撤退变为溃逃,兵力损耗过大的主要原因。

对上高会战的胜利,评论中肯入理。称它是一次难得的、始终掌握着战场主动权而致胜的会战。指出会战所以获胜,是因为针对当面敌情制定了正确的战役方针和作战计划。当战役打响后,日军本欲作向心合击,而中国第七十军却反其道而行之,故意作离心退却,诱使北路日军更加向北,这不仅破坏了日军的合击企图,而且使中路日军侧背暴露。中路日军主力突过第一、二线阵地后继续深入,中国第七十四军凭借既设阵地,抗击敌进攻6天之久,使机动位置的主力,能从两翼赶到对其构成合围。但以绝对优势兵力将伤亡过半之敌四面包围压缩于狭小地区的中国军队,连攻三天仍未将敌全歼,反任被围之敌在不大兵力的增援接应下,拖着大批伤员突围而逃,说明中国军队的攻击精神和攻击力量都太弱。

对豫、湘、桂会战更是宽视野地考量评析。书中指出,台湾大量抗日战史著作将这次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把大量精锐部队使用于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致使中原战场兵力薄弱。此说有一定道理,但决不是主要原因。日军是集中了中国战场上的主要作战部队,实施远离后方基地、深入到西南腹地的远程进攻作战。日军主力南进之后,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日军的兵力相当薄弱,而且更为分散。日军当时也最担心它的后方联络和供应问题。而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等战区各握有十几万到几十万兵力的军队,为什么不向当面的日军发动进攻呢?位于陕西的胡宗南部几十万精锐部队的当面仅潼关附近驻有一部日军,该部为什么不能转用于西南战场呢?假如各战区向日军积极发动进攻,切断日军第十一军的后方联系,桂、柳会战当不是前述的结局。在桂、柳会战中,日军在中美空军不断袭击的条件下,不过二十几天就前进了700

公里,平均每天竟前进 30 公里。有坚固国防工事的广西门户——全县在日军到达前就弃守,柳州守军防守 1 天就仓皇逃离,储有大量军需物资的战略基地独山,在有援军到达的情况下仅稍加抵抗就匆匆退走。由此不难看出,豫、湘、桂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作战指导失误,决定性的因素是国民党最高决策集团的消极抗战、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用于战后对付中国共产党。因而国民党军队许多高级将领腐败,军队战斗力下降,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湘、桂作战的失败在国内引起各阶层人民的普遍不满。应该说评析是令人信服的。

四 对英勇作战殉国者称颂,对怕死逃跑变节者谴责

正面战场广大爱国官兵面对优势武器装备日军的大举进攻,以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英勇顽强地与侵略者战斗,流血牺牲者可谓千千万万,书中对他们浴血奋战的业绩和以身殉国的将士多有称颂。如在娘子关附近作战中写道,日军攻陷井陉后,向第十七师雪花山守军阵地攻击,守军奋勇阻击,日军未能得逞,第十七师师长赵寿山乘夜转移攻势,攻进井陉南关车站,不意雪花山被日军一部攻占,赵师长立即增调部队向雪花山反击,鏖战至拂晓,第十七师伤亡逾千。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回援娘子关,向旧关实施三次反击,其第二十七师将由旧关出援关沟的日军逐向旧关,两日内守军于旧关附近歼灭日军 500 多人。第三十一师冲入旧关,经激烈肉搏巷战后,日军被迫退据旧关以东高地。在台儿庄战斗中写道,日军占领了城墙的东北角,一部突入城内,师长池峰城指挥第一八六团立即反击,双方展开激烈巷战,终将突入之敌压迫于城内大庙附近,经 4 天激战,伤亡 2800 人。为制止敌人扩展,该师将所有能够战斗的勤杂人员全部组织起来投入战

斗,双方展开激烈的肉搏拉锯战,隔墙相击,逐屋争夺。在常德会战中,预十师师长孙明瑾在战斗中身中4弹,壮烈牺牲。掩护突围的第一六九团柴意新团长及留城掩护人员全部牺牲。在桂、柳会战中,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继恒、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第一七〇师副师长胡原基、第一三一师第三九二团团团长吴展等以下官兵240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率所部巷战到最后,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自杀殉国。

另一方面,对贪生怕死、擅离职守、临阵逃跑以及变节投敌的人物,在多处进行指名谴责。在南京保卫战后期撤退中,指出第二军团团长徐源泉、第七十一军军长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第二旅旅长胡启儒等人的渎职行为。在太原会战中,指出阎锡山将守天镇不力的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枪决。在济南、青岛失陷中,指出由于韩复榘屡次擅自撤退,贻误战机,经军事法庭会审后处决。在徐州会战中,指出第二十军团军团长汤恩伯按兵不动和避战的行为,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第一〇二师师长柏辉章、第八军军长黄杰、第一八七师师长彭林生等擅自撤退的行为。在衡阳战斗中,指出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派参谋长孙鸣全与日军联系投降事宜,8日晨方先觉率其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一九〇师师长容有略、预十师师长葛先才、暂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及副官处处长孙广宽与日军头目会见,正式缴械投降。在叙述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游击队大批降敌中,列出了集团军总司令、军长、纵队司令、师长、支队司令、旅长各级投敌将领石友三、庞炳勋、孙殿英、丁树本等共32人的姓名。

正反两面的人物,在抗日战争史上各有自己的位置。绪论在结尾中写道,在抗日战争中,为保卫国家、民族,在正面战场英勇作战而捐躯的军人不知其数,其中高级将领也有大批,如赵登禹、佟麟阁、张自忠、郝梦麟、刘家麒、戴安澜、王铭章、李家钰、陈安宝

等等。这些官兵,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中肯定了他们的抗日业绩,颂扬了他们的爱国精神,中华各民族人民永远怀念他们;而对那些在强敌侵略面前,叛国投敌的汪精卫、李长江、孙殿英、孙良诚、庞炳勋等民族败类则永远唾弃和蔑视。

五 对两个战场的关系作了符合实际的客观评价

中国抗日战争客观形成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写正面战场不能不涉及敌后战场。本书在着重反映正面战场的同时,对两个战场的关系作了符合实际的客观评价。书中在叙述了两个战场的形成过程后,指出在抗战之初经国共两党郑重磋商取得共识和谅解而确定的分工与战略部署,即国民党军担任正面战场作战,以打正规战为主;八路军等担任侧面及敌后作战,以打游击战为主,并且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这种分工和部署是正确的,它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中国军队从正面、侧面和后方的包围和夹击中而不能自拔。两个战场互相间的配合,以战略上的配合为基本的、经常的配合形式。即两个战场各自实施相对独立的作战,牵制、打击和消耗当面日军,使其处于我两个战场的包围和夹击之中,顾此失彼;使我军达到互相支援、共同完成持久战战略方针之目的。还有一种配合兼有战略和战役的两重意义,如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时的配合,以及百团大战时的配合。再一种配合则是直接的战役配合,如晋南会战时的配合。这些配合都是客观的,不能忽略,更不能抹杀。综观中国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犹如人的左右臂各司其能,共策全功,缺一不可。中国的抗日战争只有一个,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只是抗日军队作战地域的划分,是统一的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

部分,少了任何一个都不是完整的抗日战争。完整的抗日战争是不能割裂的。

在书中特别对敌后战场的重要地位作用给予应有的评价。指出敌后战场担负着在敌人占领区内进行游击战争的任务。由于与正面战场相隔甚远,游击战争只能在敌人的深远后方,在被敌人严密封锁和疯狂“扫荡”的状态下进行,游击队常常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生存与作战极其困难。但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干的敌后抗日部队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深入虎穴,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猛烈的游击战争,8年间共进行大小战斗2万余次,使敌人如坐在火山口上,惶惶不可终日;而我军收复失地100万平方公里,解救同胞近1亿人口,粉碎了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圆满完成了配合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战的战略任务。

书中没有过多地述及国共两党军队的军事摩擦与冲突,认为,如果在抗日战争问题上过多地论及“阙墙”之事,则“御侮”之事也就难以说清。但是,也没有着意去回避它、掩盖它,而是用不多的笔墨点到为止。如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肯定其主要的、积极方面的同时,也指出蒋介石在会上一再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政策,会后,国民党中央连续秘密下发《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并派部队赴冀、鲁,“限制共党之发展”,由此引起一系列摩擦事件。1939年11月,又在五届六中全会上决定武力限共。当年12月至1940年初在陕、晋,1941年1月在皖南,1943年7月在陕北,国民党三次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蒋介石坚持反共、限共政策,采取种种政治、军事行动,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只是由于共产党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进行斗争,才阻止了国共分裂的危险,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抗战得以坚持到底。综观这8年抗战,蒋介石坚持了抗战,又坚持了反共。

六 书中提出一些值得研究的论点和看法

关于持久消耗战略总方针何时形成?书中提出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抗日战略总方针“持久消耗”是随着中日关系和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直到全面抗战开始后才逐渐形成、确立的,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似乎早在 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就有了基本的战略构想。1935 年国民党军队追击红军入川,蒋介石认为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才产生了抗日战略的初步构想。1936 年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制的《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中写明,“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显然不是战略方针,仅是作战指导方针。直到武汉会战,从蒋介石的各次讲话、命令和军事委员会的作战计划,还都是以加强防御措施、保卫武汉核心为中心,尚没有形成完整的指导尔后阶段战争的具体方针。1938 年 11 月 25 日,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会议上,从战略上将抗日战争分为两个时期:“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退军、岳州沦陷为止是抗战第一时期”,“从今以后的战争,为第二期”。第一期是“拿我们的劣势军备,一面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一面根据抗战的经验来培养我们自己的力量,以逐渐完成我们最后战胜的布置”。第二期是“遂行转守为攻的任务,达到转败为胜的目的”,两个战略阶段任务的规定,标志着持久消耗战略总方针已经全面形成并确立。而且,前述作者对国民党持久消耗战略方针的批评,也是以此为对象的。

关于对花园口决堤的评价。书中提出,海峡两岸都有一些人认为此举的军事作用显著,既保住了豫中、豫西及陕西等大片国土不被日军占领,又推迟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等等。姑不论此举使豫、皖、苏 3 省 40 多个县市的地区沦为泽国,数十万人民葬身洪

流,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而长期的灾难等政治、经济、道德方面的后果及影响,仅从军事角度看,上述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从第一战区的角度而言,决堤造成水障,确实起了阻止日军西进的作用,暂时保住了豫中、豫西等地区;但就战略范围而言,水障既未能阻止日军进攻武汉,也没有推迟武汉会战的时间。恰恰是在决堤放水期间,日本内阁、大本营在6月15日御前会议决定进攻武汉。所不同的,仅仅是主攻方向不是由平汉路南下,而是沿长江西进。其实,日军进攻武汉的主攻方向本来就有两种选择。以平汉路为主攻方向,则不仅海军毫无用武之地,更重要的是要保障以平汉路为后方补给交通线的畅通,比保障长江畅通要困难得多。事实上,不沿平汉路南下进攻武汉,而沿长江、淮河西进进攻武汉的构想,早在花园口决堤之前日军大本营已经有了腹案。所以,对花园口决堤的军事上的作用是不宜夸大的。进一步探讨,如果不放水淹死数十万人民群众,不使上千万人民群众散逃他乡,而是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游击战争,对抗战必定更为有利。

关于两个战场牵制敌军兵力的数量问题,书中提出从8年的全过程来看,日军在1938年10月以前的战略进攻和1944年4月以后的“一号作战”进攻期间,用于正面战场的兵力较多;中间的5年为战略保守期,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较多(另有几十万伪军在敌后战场)。所以两个战场牵制的敌军兵力是大体相当的。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数百万军队8年的全国性抗战,要在120余万字的上下两册中面面俱到、全部详细地反映是相当困难的,不完善之处也在所难免。书中个别章节繁简适度方面还有些不足。如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第十九路军多次请求增援,国民政府军事当局除派第五军前往参战外,书中还三次提到派出增援部队,计有第一、第四、第六、第四十七师和第二、第八、第十四军等

部,番号确不算少,但未明确有哪一支部队,在 3 月 1 日撤退前,到达了作战前线、参加了战斗。书中个别词语的称谓还有不够统一之处,如 1939 年 9 月欧洲大战爆发,绝大多数章节均统一称为欧战爆发,但有个别地方又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 984 页)。在绥远抗战中,增设了收复锡拉木楞庙一目,有强调该作战的意义,但过去一般出版物中多称该地为大庙,似宜在锡拉木楞庙后括注大庙。1939 年申报馆出版之中国分省新图注文为大庙(沙拉木伦)。第八章的芷江地区作战,参照老河口地区作战(豫西、鄂北会战)的标题,也宜加括注湘西会战。此外,所附作战经过要图有的地方不够规范,有的图区分市、县、村镇,有的图不区分市、县、村镇,都是一种标号。有的在上一幅图上,有的市、县、区分出了,有的则未区分(如第 483 页图),可能属校对疏漏。地名也有的不统一,两种名称都出现,如德县、德州,沧县、沧州,朔县、朔州等。对一部有开拓性成果的巨著来说,这些也许是苛求了。

(作者罗焕章,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部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仲明)